

一般论文
Research Articles

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 与变迁初探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ty in Sungai Chuah

何启才
(HO Kee Chye)

摘要

位于雪兰莪州加影的锡米山新村是一座靠近城市的华人聚落。它距离加影市约2公里,和首都吉隆坡的距离则约为30公里。锡米山新村是在紧急状态时期,在“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下成立。在此之前,已有华人随着锡矿的开采而移居该处,加上当地蕴藏着大量锡矿,故称之“锡米山”。由于当地早有马来文官方地名——Sungai Chuah,华人迁入后再赋予该处中文地名,及至紧急状态时期英国殖民地当局又设立了移殖区——锡米山新村,导致经过经济、历史和时代的发展后,当地居民对于他们居住的区域范围和概念出现了不同的认知。为此,本文首先尝试厘清该处一地三名的问题,再梳理早期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及锡米山新村的成立经过。由于锡米山发展和华人开发锡矿及从事橡胶业息息相关,本文也概述了锡米山华人的经济发展。本文认为,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与演变,基本上先由经济因素促成,最后则受政治因素影响而定型。

关键词: 紧急状态、锡米山新村、加影、锡矿业、橡胶业

Abstract

Sungai Chuah New Village is located in Kajang, Selangor. It is about 2 km from Kajang town and 30km away from Kuala Lumpur, the capital city of Malaysia. Sungai Chuah New Village was established during the period of "Emergency" under the "Briggs' Plan". Prior to this, Chinese migrated there due to the founding of tin, subsequently a Chinese community formed. Because the place was rich in tin, hence Chinese miners called the place as "Mountain of Tin". However, the place has earlier been formally called Sungai Chuah in Malay. After the Chinese moved in, they gave it a Chinese name. Another name was given during the State of Emergency by the British colonial authorities when they set up a resettlement area called "Sungai Chuah New Village". The economic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the lapse of time shap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local residents nowadays on the scope and concept of that area. To this end, this paper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problem of the area with three names, the formation of the early Chinese community in Sungai Chuah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Sungai Chuah New Village. Since the development of Sungai Chuah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in mining and rubber industries, this paper also tries to give an outline on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ungai Chuah Chinese Community. As a conclusion, this paper argues that basically economic factors contributed substantially to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ungai Chuah, but ultimately fixed by political factors.

Keywords: State of Emergency, Sungai Chuah New Village, Kajang, tin mining, rubber industry

一、前言

马来西亚的华人聚落主要集中在城市，其次则集中在市镇和新村。这样的聚落分布，其实和马来西亚的历史发展有所关联。其中，新村的出现，更涉及了大历史背景下人为的大规模迁移计划。座落于雪兰莪州的锡米山新村（Sungai Chua New Village）就是在这样的情景下诞生。

锡米山新村位于锡米山（官方地名为Sungai Chua）的范围之内，距毗邻的加影市（Kajang）仅约2公里。锡米山新村的成立，缘自于马来西亚英殖民政府在紧急状态时期为断绝马来亚共产党（马共）从垦耕者¹（squatter）取得食物、药物和情报，而实施的集中营式的居住计划。

锡米山新村成立于1951年，当时的人口约有4191人。除原有的锡米山居民外，也接收许多来自加焦（Kachau）、书房背（Sungai Kantan）、老港（Sungai Jelok）、武来岸（Broga）和阿依淡（Ayer Hitam）等郊区华人。（倪可健2005：35）另外，根据地方文史研究者，也是社区文物资料中心主任李成金的叙述，在1951年初，原居住在锡米山（即今新村）的45户居民曾因被怀疑援助和提供情报给马共而被令迁出该地。居民强烈反对搬迁，并保证绝对效忠政府，在村民自资及华人事务官的协助下，将村里南部地区（应为今篮球场后面一带）围上篱笆而被纳入“锡米山新村”的范围内。（《东方日报》2003年11月28日）之后，由于垦耕者大规模被迁入锡米山新村，致使锡米山新村成为了当时乌鲁冷岳县第二大的新村。锡米山新村的村民以客家人为主，也有福建人和广东人。（爱新村多媒体n.d.[a]）

在锡米山新村出现以前，新村原址就住有华人。虽然华人在锡米山定居的年份难以考查，但可以确定的是在1870年代以后就有大批华人陆续迁入锡米山。这是因为在锡米山发现蕴藏大量的锡矿，以及在加影成功种植了马来亚的第一片橡胶园。因此，早期锡米山的华人主要还是从事锡矿业或橡胶业。（爱新村多媒体n.d.[a]）锡和橡胶乃是马来西亚19及20世纪的两种重要经济产品，而锡米山正好兼得二者，促成了加影和锡米山的发展，也造就了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

二、区域认知之异同：

“Sungai Chua”、“锡米山”、“锡米山新村”

笔者在锡米山新村进行调研时，发现许多锡米山新村的居民对于“Sungai Chua”和“锡米山”（甚至“锡米山新村”）的范围和概念皆有不同的说法。为此，笔者尝试就文献资料和访谈结果，梳理“Sungai Chua”、“锡米山”和“锡米山新村”的基本概念和历史背景，厘清它们之间的区域形成与划分，相信这将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地居民对于Sungai Chua和锡米山区域的基本认知之异同。

(一) Sungai Chua

“Sungai Chua”为锡米山的官方马来文名称。按本地对地名的一般写和读的习惯，Sungai Chua应被称为“双溪朱雅”、“朱雅河”、“双溪蔡”²或“蔡河”等等。无论如何，Sungai Chua这样的地名，至少可理解为是取自该地区的某条河流名称。但是，在锡米山的地图内并没发现有锡米山里有河流或小溪，仅在锡米山外围，和加影主要通道间有一条冷岳河（Sungai Langat）的支流。由于该支流最后又汇入冷岳河，因此，加影—锡米山这一段的冷岳河依然被称作“冷岳河”（亦称作“呀吃河”）。

根据部分采访资料显示，受访者都不知道和Sungai Chua相关的这条河流。居住在锡米山逾60年的冯先生表示，他没有听说过哪一条河是被称为Sungai Chua。虽然他记得锡米山新村附近有一条大水沟，但他认为这和Sungai Chua之名无关。冯先生认为，所谓的Sungai Chua河，应该就是冷岳河在加影—锡米山这一段的叫法。（冯先生，访谈，锡米山，2011年2月18日）另一位受访者曾先生表示，他只记得锡米山内只有一条大水沟，并没发现有哪条河是被叫做Sungai Chua。（曾先生，访谈，锡米山，2011年2月24日）因此，有理由相信所谓的Sungai Chua，应该就是冷岳河在加影—锡米山河段的一个别称。

至于Sungai Chua的“Chua”是否为“蔡”姓华人（福建籍或潮州籍）的马来文姓氏拼写尚不得而知。不过，综合现有资料和调研的结果，皆未发现早期的锡米山曾经出现过任何显赫或极具影响力的蔡氏族裔，足以让后人以其性命地名。因此，认为Sungai Chua源自于“蔡姓”的说法显得有些牵强。以下则根据字典对于“Chua”的解释进行推论：

1. 马来西亚语文出版局的辞典*Kamus Dewan*（第四版）虽无“chua”字，却收入了和水相关的“cuah”字，其意思为“mencurah”（即“倾注”、“流注”之意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于1972年5月23日签署了一项关于语言、文化和教育的合作协定。此合作协定包括了推行经由两国语言专家同意的“新拼音”（Ejaan Baru）和“统一拼音”（Ejaan

Yang Disempurnakan) 方案。在此之前, 马来西亚使用的马来文是旧拼音 (Ejaan Lama)。(《星洲日报》1972年5月25日: 5) 因此, 今日 Sungai Chua的“chua”, 应是演变自旧拼音的“chuah”(新拼音应该为“cuah”)。

2. 根据1970年出版的*Kamus Dewan* (第一版), “chuah”的意思是“menchurah”、membuang; (Teuku Iskandar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0: 200) 而杨贵谊和陈妙华编的1972年版《马来语大词典》中, “chuah”的中文意思为“倾注、倾倒”。(1972: 296)

另外, 从国家档案馆中可查得有关Sungai Chua的档案中, 亦可发现早期Sungai Chua的名称并不一致, 使用的名称包括“Sungei Chua”、“Sungei Chuah”、“Sungei Chuaah”或“Sungai Chuau”等。

根据加影市议会对加影地理环境的介绍中, 提到加影县的地貌多为山丘高地, 其平地则处在如冷岳河、万宜河、士毛月河和朱雅河的河盆一带。这些盆地乃是最早开发成为居住地。⁴ 由于盆地地势较低, 加上靠近河流, 最是容易泛滥成灾。《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设教百周年纪念特刊》里记载日本侵略加影时, 也有提到河水泛滥的现象:

“……英军撤退, 把加影锡米山路的大桥与火车路铁桥统统炸毁。锡米山通往加影只能用临时的轮渡代步, 遇到雨水泛滥就没法渡过……”

(倪可健2005: 34)

即使是到了1940年代, 加影—锡米山交界处的河水依旧容易泛滥。1971年元旦发生的加影大水灾, 也是因为大雨不停地下, 造成冷岳河河水泛滥。(加影商矿公会1985: 85) 由此可见, Sungai Chua的命名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加影—锡米山的冷岳河段的河水经常满溢倾注而得。

(二) 锡米山

华人“锡米山”中文地名之由来, 顾名思义, 想来应是该地盛产锡

米，因此被雇前来开采的华人就以“锡米山”称之。《锡米山学校校史》的资料也认为，“锡米山”名称源于：

“……由于地矿丰富大有‘遍地锡米、俯拾皆是。’所以，当时华裔同胞多以‘锡米山’名之，历久相沿，以迄今日，此是埠名的缘起……”。

（霍刚略1959）

锡米山发现蕴藏有丰富的锡矿，则约在1870年代初期。当时正值雪兰莪内战，并在英殖民政府的干预下平息下来。和锡米山毗邻的加影则被选为行政中心。锡米山因为发现锡矿而取代了呀吃14里的碳山（Bukit Arang）和加影附近的炉古（Reko）。（李成金2006）因为锡矿的发现，华工大量涌进了锡米山。当时最早开采的矿地位于锡米山新村后面的工业区（锡矿湖已被填土，建成中小型工业区）；另一座锡矿的位置则在锡米山新村对面的芭烂区。这座废弃的锡矿湖约有30亩，目前已被加影市议会改成休闲公园，供民众使用。

根据上述两座锡矿的位置，笔者认为“锡米山”早期的范围，即是当时华工所聚居的矿场四围，因此，“锡米山”的范围即包括了：今之锡米山新村、刘家村（即锡米山埃索科（ESSO）油站对面的地区）和芭烂。此外，文史工作者李成金先生所指的锡米山早期之范围，即从卫理公会教堂延伸至锡米山学校的高坡地带（爱新村多媒体n.d.[a]），也符合了笔者上述之推测。

（三）锡米山新村

1948年，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英国殖民地政府为了有效断绝森林边区的垦耕者提供马共食物、药物和情报，于1950年开始推行“毕礼斯计划”，强制这些垦耕者迁入被严加管护的移殖区。当时，华人聚居的锡米山被选为安置垦耕者的“移殖区”，正式取名为“锡米山新村”（Sungai Chua New Village）。锡米山四周的地区如加焦、书房背、老港、武来岸、阿依淡等地的垦耕者都被移殖到锡米山新村。新村四周则围起篱笆，

并安装了铁蒺藜。此外还有军警站岗，出入闸口设有路障，进出都需要被检查，严防新村居民将食物、药品等偷偷带出村外。

根据访谈得知，英殖民政府设定的锡米山新村范围，其实和现今新村的范围相差无几。锡米山新村被用篱笆围起来的范围，是从今日锡米山马华公会支会会所开始（此处为闸口），连接至刘家村、关东巴鲁（Kwantong Baru）、佛山（锡米山山顶），再到今日的工业区入口处（或是Sungai Ramal外；此处为闸口）；再由此闸口连至武吉安甲（Bukit Angkat）、芭烂，最后连接回马华支会会所的闸口。（冯先生2011年2月18日）此外，新村的房子也经过规划，房屋门牌号码的排序是从武吉安甲开始标起的。

（四）小结

从上述推论看来，19世纪初期的Sungai Chua和锡米山应该是属于不同的范围概念。Sungai Chua的开埠和加影的开埠应该属于相同时期。而锡米山则属于较晚时期。根据加影市议会的资料，其中有谈及加影及其周围地区在开埠以前，本是当地原住民的居留地，1709年被巴生（Klang）迁来的原住民开拓成居留点。（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n.d.）另外，由于河流为当时的主要交通通道，因此相信前来开拓的原住民或马来人在迁徙过程中会选择适合耕种的盆地定居。因此，位于Sungai Chua和加影交界的盆地大概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而成为最初的聚居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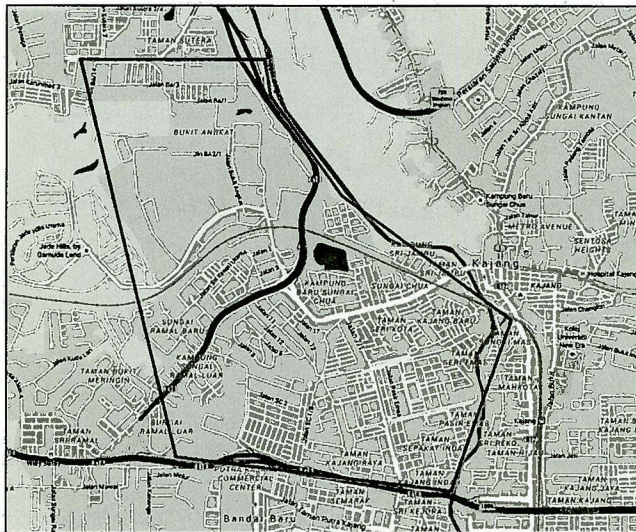
综合上述之资料，“Sungai Chua”最先应为原住民或马来人所开拓，并因该处的河水经常满溢而命名之。“锡米山”则为华人于19世纪70年代前来采矿，落脚于今日之锡米山新村及芭烂（也称“巴南”）一带，因该地属高坡地带（即今日的锡米山华文学校一带），故合之以“锡米”和“山”而曰“锡米山”。

早期的“锡米山”应为通称，故无英文或马来文的专有地名。为方便和友族或英籍官员沟通，当地华人沿用了“Sungai Chua”的地名作为“锡米山”的外语名称。因此，当锡米山新村成立时，官方名称即为“Sungai Chua New Village”。而“锡米山新村”的成立，也取代了原来的锡米山

社区。加上锡米山新村的范围和原来的锡米山范围几乎一致，因此中文地名的变化——锡米山或锡米山新村，对居民而言，并无过大的影响或改变。他们还是继续将锡米山及锡米山新村等同看待。可以说，这个被蒺藜围绕着的锡米山新村成立后，反而使当地居民们对原来仅存于想象中的锡米山社区开始有了清楚的标示和概念。

至于Sungai Chua，其早期范围应只局限在和加影交接的河岸一带，后来随着锡米矿业、橡胶业的发展而逐渐扩大并涵盖锡米山。可以说Sungai Chua实为广义上的“锡米山”。受访者曾先生认为，Sungai Chua肯定比锡米山还大，其范围还有包括许多花园式住宅。而锡米山的范围并不完全包括花园式住宅区。（曾先生2011年2月24日）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锡米山的基本设备、公共场所、商场等到处林立，居民即使只在锡米山活动也能满足日常需求，尤其是公共场所如巴刹，只要不跨越公路桥到加影市区，这些巴刹、商业区等地就成了居民在锡米山各地流动的公共区域。因为这些内部区域的流动性，逐渐使到当地华人已习惯将“Sungai Chua”、“锡米山”和“锡米山新村”等同看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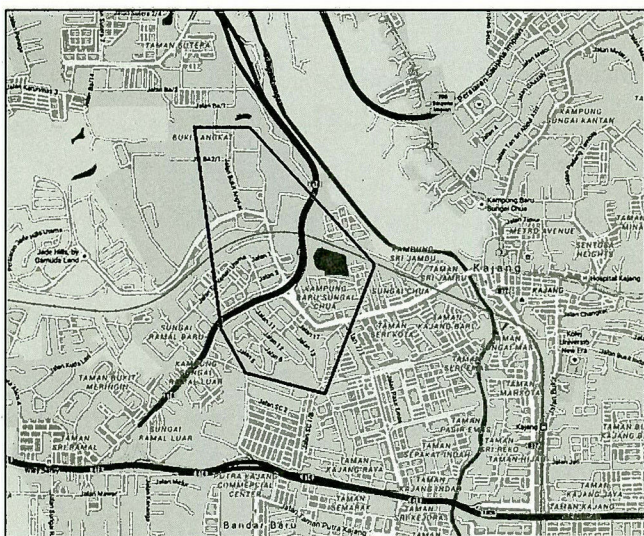
图1: Sungai Chua的大致范围



说明：粗框部分为笔者标示的区域范围。

图片来源：Google Map。

图2: 锡米山/锡米山新村的大致范围



说明: 粗框部分为笔者标示的区域范围。

图片来源: Google Map。

三、早期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及锡米山新村的成立

(一) 锡米山华人社区

自有聚落以来,锡米山就不曾发展成为一座重要的行政或商业重镇。反之,与锡米山毗邻的加影却一直扮演着乌鲁冷岳区里一个重要的行政和商业中心。关于这一点,可以从加影于1885年就设有县署,1900年期间建造火车站和邮政局,1907年建设加影县医院等重要建筑和设备中得知。

反观锡米山,除了因为锡矿的发现使得华人人口激增及与矿业相关的事务获得发展外,其主要的市镇功能还是在于出产和输出锡和橡胶这两种经济产品。由于加影和锡米山的市镇功能的重要性有别,因此导致了锡米山社区的史料记载和留存远不如加影的史料来的丰富且详细。无论如何,由于锡米山和加影相隔仅咫尺之遥,彼此间又有着很大的依赖性,因此深入研究锡米山华人社区早期的形成与发展,还须借助现有的加影史料。

关于锡米山华人社区，一般认为是在1870年代发现锡矿以后才形成。在此之前，是否已有华人居住在锡米山则不得而知。不过，在锡米山和加影附近的地区，如武来岸（Broga）、呀吃十四里（Batu 14）、炉古等地，在19世纪中叶就已有采矿活动进行。例如，1851年，武来岸就有惠州华人迁入，而当时已经有英国人在武来岸勘测锡米及采矿（爱新村多媒体n.d.[b]）；1867年，呀吃十四里由嘉应人陈亚泉率领了400人负责开拓和进行采矿。（爱新村多媒体n.d.[c]）而与加影毗邻士毛月镇的开埠年份则约于1880年。这些华人聚落得以形成，主要是因为冷岳河流域（Sungai Langat Valley）蕴藏丰富的锡产。华人沿着冷岳河到各个流域的锡矿区，如雪邦、龙溪、加影、锡米山、蕉赖、呀吃等地寻找生计，最后在该地落地生根。这些地方都盛产锡矿：

“在乌鲁冷岳，盛极一时的采矿区，除了早期的呀吃十四英里，以及后来的加影和士毛月，接下来便算是呀吃十八英里了。”

（爱新村多媒体n.d.[d]）

加影（包括锡米山地区）的锡矿业虽然比呀吃十四英里和炉古还来得迟，但却得以蓬勃发展。（刘崇汉2008：2）冷岳河流域除了盛产锡产之外，也是重要的交通枢纽，主要被利用来运载锡产和橡胶到港口，然后运到欧洲。而马来亚当时的重要口岸，即1901年建成，座落在巴生的瑞天咸港口（Port Swettenham）。（爱新村多媒体n.d.[e]）

一般以为，加影在1709年就有村民居住当地。但是直到锡米山发现锡矿后，锡米山开始兴旺起来，使得加影连带地也发展成一个重要的市镇。此外，锡米山和加影得以兴旺，除因盛产锡矿和橡胶，也和雪兰莪的内战有关。雪兰莪内战发生于1867年至1873年期间，主要是因为马来皇族的两个集团（即Tengku Kudin和Raja Mahadi）对于锡米征税和矿区控制权而导致的冲突。（刘崇汉1998：47；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2003：19）由于担心这场内战会使到本身的经济利益受到影响，英海峡殖民地政府选择支持Tengku Kudin的阵营。在叶亚来和英殖民政府的协助下，Tengku Kudin赢了这场内战。

战乱平息后，叶亚来为重建吉隆坡，便派助手赵煜在蕉赖和冷岳区推行屯田自足的计划。此计划不但成功将冷岳区变为吉隆坡的米仓，也使赵煜在乌鲁冷岳区挖到锡米仓，间接促进了锡矿业的发展。（爱新村多媒体n.d.[f]）1875年，英殖民政府指派了James Guthrie Davidson为雪兰莪州参政司，并将位于乌鲁冷岳南部的加影发展成行政中心。在英国政治势力的干预下，雪兰莪州的局势稳定发展，相信这也是促使华人大量涌入锡米山和加影的重要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锡米山华人最初形成的时间，最有可能是是在雪兰莪内战平息后的1874年或1875年。进入1900年以后，当地的华人社区才趋向成熟和颇具规模。华人最初迁入锡米山地区主要是为了生计考量，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20世纪以后，移居锡米山的华人人口不但有所增长，许多华人也在此落地生根。这样的历史发展，也可通过许多和华人相关的基本设备及建筑物的相继设立得到佐证，这包括了：

（1）1898年：叶亚来的助手赵煜为照顾矿工而创办了一家医院。该医院便是今日加影医院的前身。加影医院的草创期间，其面积约有16英亩（爱新村多媒体n.d.[a]）

（2）1898年：有善信开始在锡米山山顶供奉弥勒菩萨，称之为“佛爷”。后来发展成为“佛爷庙”。（净妙佛教协会n.d.）

（3）1905年：加影华人基督教卫理公会就已经在锡米山设置教堂，并开办了“乐育学校”。据倪可健的研究，在卫理公会，“教堂聚会的人数⁵约有整百人，以客家人居多。而且多从中国移民此地，生活胼手胝脚，极其贫困。”（2005：32）

（4）1909年：创办了两所华文小学——文华学校和华侨学校（加影商矿公会1985：93）

（5）1925年：创建中华学校。

（二）锡米山新村

1948年6月中旬，因马共闯入园丘并杀害欧籍园丘经理事件导致英殖

民政府宣布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掀起了在马来亚境内大规模军事剿共战争的序幕。无论如何，马共凭借其二战时期在森林抗日的战斗经验，采取了进入森林武装斗争的方式，使得英殖民政府的军事行动无法取得有效的成果。为此，英政府采取了多种方法，包括成立了受军警严密监控的“新村”，企图以此隔绝马共同情者或其外围组织将粮食、医药、情报等带出新村提供给马共。

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后不久，英殖民政府就开始推行这项“新村”的移殖政策。有关当局很早就发现，由于大部分垦耕者居住在没有地契的土地和靠近森林边缘，导致当局无法有效监督和管理他们；加上部分垦耕者同情马共，经常给予马共成员所需的支持，使得当局视切断垦耕者与马共之间的联系为一个重要且亟待解决的课题。（林廷辉、方天养2005：23-24）为此，英殖民政府于1948年12月成立了“僻壤村民处置问题研究委员会”，主要搜集受村民问题、研究村民合法或非法占据土地的处理政策，以及向政府建议处理这些问题的立法事宜。该委员会于1949年2月8日正式发表《僻壤村民处置问题研究委员会报告》。（《光华日报》1949年2月10日）该报告书建议将那些无法被有效监督的垦耕者重新安置（squatters that could not be policed effectively should be resettled）。当时的殖民地政府并没有对此报告书的建议采取决定性的行动。（Comber 2008：150）此建议于1949年5月被中央政府接纳，由州政府负责搬迁事务。这项重置计划也促成了马华公会的成立，以协助安顿垦耕者及搬迁事务。此计划却因州政府和马华公会在人力和财力的匮乏下，以至没能有效解决垦耕者与马共的问题。（林廷辉、方天养2005：24-26）

1950年，毕礼斯将军（General Sir Harold Briggs）出任作战行动指挥官后，重新规划了此移殖计划的内容。这个第二阶段的移殖计划也被称为“毕礼斯计划”（Briggs' Plan）。在军警和公务人员的多方配合下，英殖民政府强制将僻壤村民迁入“移殖区”（resettlement area）。这些“移殖区”也被称为“新村”，新村四周被蒺藜圈围起来，出入口则由荷枪实弹的军警守护。此外，新村居民的食物、药物等物品都被统制配给，居民必须皆按规定的时间出入和出示身份证明等等。“毕礼斯计划”于1950年

6月开始执行，大批住在矿区或森林边缘的垦耕者被强制搬迁到移植区，并受到军警严密监视。在移植区（或称“新村”）里，村民需要登记以获取身份证。同时，村民的食物供给也已配制方式发放。除了军警外，新村里也成立了自卫团（Home Guard），村民的活动时间也得遵照宵禁令指示，不得随意进出新村。

锡米山新村也是在如此的情况下成立。锡米山新村成立于1950年，其居民的来源除了本村原有的50户之外，也从附近地区迁入许多华人。原来的村民多为客家人，而搬迁进来的居民则多为福建人。除锡矿业外，锡米山的华人主要从事割胶、建筑等行业。

锡米山新村成立不久，就被提供许多基本的设备。在这些基本设施当中，主要的有水电供应、道路建设、学校等等。（倪可健2005：34-35）在紧急状态颁布以前，锡米山华社就已经有了两所华文学校——乐育学校和中华学校。后来，当地华社倡议将乐育学校和中华学校合并，另创一所新的“培华学校”。然而，未知何故并校一事没有成功。直到紧急状态时期，在锡米山新村成立了两年后，新的华文小学也告落成。这所华文学校完成后，就接获教育局谕令，以“锡米山学校”（今已改为“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名之。教育局希望这种做法能够加强学生们的乡土观念。

（霍刚略1959）锡米山学校于1952年5月12日开课，学生的人数也因为移植区计划的关系，学生人数比此前的学校学生增加了3倍。出任锡米山学校的首任校长是霍刚略，而教师队伍则由乐育学校和中华学校这两所学校的老师组成。

在官方行政与管理方面，锡米山新村拥有的行政硬体计有警察局、移植区办公室（Resettlement Office）等。在公共设备方面，锡米山新村新建之初，就有自来水供应、柏油路、路灯、水泥水沟等基本设施。（《南洋商报》1963年12月12日）此外，村里也建有一座公众礼堂（Sungei Chua Hall）、公市等公共场所。基本上，锡米山新村可说是基本设施较为完备、监控也较为严密的一所新村。根据《雪兰莪加影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校刊（1952-1958）》学生作品里的描绘，就曾提及了当时新村的情况，例如提到了锡米山新村村民放工回家的时段，也是市集最为热闹的时候。

段；或是提及了在村内的每条路段上都驻有警察看守。（校刊编辑委员会1959）而事实也是如此，四周被蒺藜包围的锡米山新村设有两个闸口，即锡米山马华公会支会会所处闸口和Sungai Ramal闸口，这两处皆由军警负责看守。

四、锡米山华人社区的经济发展概况

（一）锡米山锡矿业的发展

如上节所述，锡米山的华人社区之形成约在1874-1875年期间，时值雪兰莪内战平息后不久，局势稳定，锡米山丰富的锡矿吸引了几位著名的矿业家如赵煜、陆佑、邱冠鸿、刘祖禁等在锡米山购置锡矿和产业。（爱新村多媒体n.d.[a]）在锡矿业的刺激下，锡米山和加影的发展可谓一日千里。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锡米山的锡矿业发展正好处于马来亚华人锡矿业的繁荣时期（1874-1889）⁶。（朱东芹2002：54-59）此时期的锡价就达到了1878年的每担20元、1883年的每担33元。（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2003：20）由此可见，锡米山在发展锡矿业之初，就已经存在着良好的内在条件和外在因素，使得锡米山华人人口的不断激增。

无论如何，马来亚锡矿业的起落也和国际市场及经济因素息息相关。1929-1930年发生的经济大萧条也波及到马来亚，锡的需求量骤减使得马来亚面临锡价暴跌的困境。为了挽救锡矿业，国际锡协理事会（International Tin Committee）制订了“锡协合约”，限定锡产国的锡产总量以调整锡产消平衡数量，以防锡价暴跌。（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2003：185）国际锡协理事会的做法有效地稳定了锡价的波动，使之不再滑落。（Li 1982：73）无论如何，锡产量的限定对大规模的矿家有利，对小规模的矿家却造成一定的打击。关于这点，陈爱梅认为：

“锡价低廉加上产量的受限，许多矿场纷纷倒闭。部分矿家为了求取生存纷纷采取合并的措施，以获得更多的产量配额。于是，更多的矿场停止操作，……矿场的停顿使华人劳工首当其冲，饱

受失业之苦。”

(2006: 21-22)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获得锡米山华人矿工在面对经济大萧条期间的资料，但相信他们也面临了上述提及的困境。然而，对锡矿业更具破坏性的，则是日军于1941年12月8日至1945年9月侵略并占领马来亚的这段期间。英军退走南部之时，除了破坏基本设施外，也摧毁了大部分作为马来亚经济命脉的锡矿和胶园。无论如何，二战以后马来亚锡矿业的恢复情况并不顺利。1948年，英政府为遏制马共及其它左翼力量的威胁，宣布了马来亚进入紧急状态。英军和马共的军事对抗，殃及到锡矿和胶园。虽然如此，锡矿业在1950年以后的发展趋于平稳，此时期适逢韩战爆发导致锡价爆升。

这个时期的锡米山新村，就发现村内也有大量的锡米，原本在紧急时期从事割胶、木工、养猪、耕田等行业的村民，大部分转行投身成为采矿工人。这个时期仍在锡米山内经营矿场的，主要有来自呀吃的锡矿大亨张昆灵、陈大利等人。（《中国报》2009年7月22日）锡米山的采矿方法，主要以射水泵和洗琉琅方式进行。锡米山锡矿业发展初期，是以传统的洗琉琅方式淘洗锡米。无论如何，据说张昆灵到锡米山采矿后，锡米山的采矿事业才得到蓬勃发展。（《星洲日报》n.d.）根据锡米山居民的讲述，锡米山的矿场都是水笔（即射水泵）从地面上往下采矿，这里的矿场没有采用铁船方式进行开采。

1985年，国际锡市场因锡产的最低价失守而崩溃，并导致了国际锡协理事会解体。1987年实施的锡出口限制因未能达至预期效果而在1996年正式取消。来年，马来西亚因本身已由锡产国变为锡消费国而推出了锡产国协会。（马来西亚华人矿务总会编2003: 188）可见，马来西亚的锡矿业在80年代已经面临惨淡经营的窘境了。在大环境的因素下，锡米山的矿业也大受影响。然而对于锡米山是在何时就停止采矿活动的说法不一：有说是在1970年代（《星洲日报》n.d.），也有说是在80年代（《中国报》2009年7月22日）。

（二）锡米山橡胶业的发展

若说锡米山是因为锡矿才得到迅速的发展，那么橡胶业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80年代的发展，可说是更大程度的支撑了锡米山经济持续繁盛的另一个基础。

马来亚的橡胶业的兴起于19世纪末，并于20世纪初年开始以农产品的形式大量栽种橡胶。马来亚橡胶业的繁盛期约落在1905-1912年，这个时期恰逢充气轮胎的发明，汽车制造业得以扩大，橡胶的需求量暴增，刺激了马来亚橡胶业总体的发展。到了1916年，橡胶的产量已经超越锡产量成为了马来亚重要的经济产品直到1980年代。（Andaya 2001: 218; Li 1982: 83-85）除了外在因素，橡胶业的迅速发展，部分原因乃仰赖于当时为了锡矿的生产和运输所需，建设而成的交通网络和相关基本设施。因为有了这些基本条件为基础，促使了橡胶业的速度发展。

在雪兰莪，橡胶的主要种植地位于乌鲁冷岳县，当时的橡胶业主要由英国人掌控。马来亚最早以橡胶作经济产品种植的橡胶园则座落在加影。1894年，R. C. M.金德斯利（Ronald Charles Murray Kindersley）和其兄弟先创办了“英芝肯尼园丘”（Inch Kenneth Estate），专门种植咖啡。1896年，他们从新加坡植物园主管H. N.理德利（H. N. Ridley）取得橡胶树苗，并种植在他们原本用来种植咖啡的5英亩园地里，成为了马来亚的第一座橡胶种植园。⁷ 1910年，他们成立了“加影橡胶园丘有限公司”（Kajang Rubber Estates Limited）。1933年，再将“英芝肯尼园丘”和“加影橡胶园丘有限公司”的名字合并，改为“英芝肯尼橡胶园丘有限公司”。

（Inch Kenneth Kajang Rubber Public Ltd. Co., 2010: ii）

英国人开始了橡胶行业后，乌鲁冷岳县的华人也纷纷涉入橡胶种植领域。1898年，刘文弟（Lau Boon Tit）在士毛月种植了54英亩的橡胶。1899年，15位华人申请在乌鲁冷岳县内的橡胶园里种植咖啡。无论如何，刘文弟的胶园最后还是于1906年转卖给了英国公司“Asiatic Rubber and Produce Company Limited”⁸。（Jackson 1968: 222; 243）和锡矿业一样，橡胶业也面临过经济大萧条的打击。于是，就有了“国际橡胶管制协

议” (International Rubber Regulation Agreement), 尝试通过限制橡胶的产量以解决橡胶业面临的困境。(Andaya 2001: 219)

及至1950年代, 加影或锡米山及其附近的橡胶园计有: 刘治国园丘、士毛月园丘、巴朗勿刹园丘等等。(爱新村多媒体n.d.[a]) 即使是在紧急时期, 锡米山的村民依然有许多人是以割胶为生。笔者大略统计了《雪兰莪加影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校刊(1952-1958)》中所收录的学生作品, 大部分自传式文章或描述新村生活的作品常有述及村民的割胶生活或从事割胶之工作。(校刊编辑委员会1959) 此外, 锡米山新村的首任村长万森的公子——万福良, 接受《中国报》专题访问时如此回忆: “当时村里的壮男, 很多都到张昆灵矿场采锡养妻活儿, 其余的从事割胶、务农或做小生意”、“以前胶工5点便起身, 集中在闸门附近的小食档, 等待开闸门出外工作……”。(蓝子雄1988年8月7日) 寥寥数语, 就概括了当时锡米山新村华人的经济生活与状况。

20世纪90年代由于橡胶业面临劳力的严重短缺, 同时国际胶价持续下滑, 致使其国际市场逐渐萎缩。与此同时, 马来西亚的经济正步入工业发展的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 锡米山华人的经济也面临着另一次的变化。橡胶业不景气的当儿, 棕油的市场却受到青睐。然而, 这一次农业经济的转变, 似乎对锡米山华人一直以来的经济承袭惯式不再有效。在锡米山社区进行调研时, 可以发现到锡米山华人社区近20年来的经济活动, 除了主要的家庭工业和中型工业外, 也趋向于多元化的发展。

五、结语

锡米山的开发和发展, 最先和华人前来此处寻找基本生计和经济利益不无关系。锡米山开发锡矿之初, 正值锡矿国际市场处于有利因素, 因此华人在开矿之余, 也有基本的经济能力在锡米山落脚, 形成了华人在锡米山的最早的社区。二十世纪初期, 正当锡产经济滑下坡时, 锡米山成功发展了其橡胶产业, 迎上橡胶国际市场的最佳时期, 使得锡米山华人可以适时从锡矿业转向橡胶业。如此的经济承接和延续, 可说是华人社区得以在

锡米山稳定发展的重要因素。

按林廷辉和方天养的说法，19世纪末越来越多的华人到来马来亚的矿场和橡胶园丘工作，同时也导致从事农业等活动的垦耕者随着增加。同时，世界政治和经济局势的变动也对垦耕者的数量增减有所影响。

（2005：22）以此类推，当经济大萧条导致了锡和橡胶市场萎缩之际，锡米山的华人除了在矿场和橡胶园工作以外，也从事垦耕活动。如此一来，锡米山华人的经济活动也变得多元化。另一方面，锡矿市场在70年代萎靡后，橡胶市场在马来西亚仍然持续至1980或1990年代才逐渐没落。而在锡矿和橡胶业过渡期间的70至90年代，锡米山新村的华人经济又适逢家庭工业的崛起和发展，尤其是在一般的家庭工业和家具工业领域颇具发展潜质，正好补上了锡矿业、橡胶业逐步退出马来西亚重要经济市场的空白，又赶上了马来西亚发展中小型工业的浪潮。在这样一次又一次的转换过程中，锡米山华人社区不但真实地反映了马来西亚整体经济结构与发展的轨迹，也展现了锡米山作为一座处在城市边缘的华人社区的历史特色与真实面貌。

在政治方面，马来亚华人的政治觉醒程度普遍上比其它族群来的高。因此，华人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也比较积极。在马来亚抗日期间，锡米山的许多华人积极投入抗日行列，保家卫国。由于抗日军和马共的关系密切，间接使得锡米山华人的左翼运动在战后得到迅速发展。因此，当马来亚实施紧急状态后，锡米山附近地区的华人在“毕礼斯计划”下，重新被安置在“移植区”里，并受到军警的严密管制。自此，锡米山的华人社区就被转移到了“锡米山新村”。

锡米山华人社区的形成与演变，可说是由经济因素促成，再经由政治因素定型。然而，因为华人新村的成立过于仓促，因此留下了许多问题有待解决，如：经济发展、民生问题、地契年限等。锡米山新村于1970、1980年代开始发展家庭工业，1990年代后期进入工业发展。然而，这些工业发展的转型依然面对不同程度的问题。例如锡米山中小型工业区约于1995年设立后，至到2007年仍面对地契问题。（《东方日报》2006年10月8日；《南洋商报》2007年4月7日）时至今日，上述的许多问题依然是锡米山新

村的主要梦魇。

注释

- 1 本文沿用林廷辉和方天养对“squatter”的中文翻译“垦耕者”。
- 2 以姓氏把“Sungai Chua”译成“双溪蔡”的地名，仅在加影商矿公会庆祝75周年特刊内的一篇文章〈老加影——双溪丁加〉中出现过。（加影商矿公会1985：75）到目前为止，尚未发现有哪些旧报或文献资料也是如此叫法。
- 3 《普及词典》关于“mencurah”的解释为“mengalir turun dengan deras”（倾注）及“cucur”（流注）。（详见陈达生等1987：202）
- 4 原文：“...Mukim Kajang adalah terletak di kawasan tanah tinggi iaitu lebih kurang 76,250 sm dari paras laut. Kebanyakan permukaan buminya adalah berbukit bukau dan dipenuhi oleh gunung. Tanah datarnya terdapat di kawasan-kawasan lembangan sungai seperti Sungai Langat, Sungai Bangi, Sungai Semenyih dan Sungai Chua. Kawasan-kawasan inilah yang merupakan tempat-tempat awal yang mula diterokai untuk penempatan di Mukim Kajang...”.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n.d.)
- 5 笔者认为，文中的“人数”应指当时的华人人数。
- 6 朱东芹在论述华人私会党与华人锡矿业的关系与发展时，对马来亚华人锡矿业做出三个阶段的发展，即（1）1848-1860：华人锡矿业的兴起时期；（2）1860-1874：华人锡矿业的破坏时期；和（3）1874-1889：华人锡矿业的繁荣时期。
- 7 由于橡胶需要9年的成长时间，因此当时在橡胶种植时，也间种咖啡、等其他农作物。马来亚种植橡胶始于1896年，因此大约在1905年橡胶树便达到生产年龄，因此其他间种农作物就被砍除掉。所以马来亚的橡胶园面积在1906年以后逐渐增加，其他农作物的种植面积则相对地骤减。
- 8 Asiatic Rubber and Produce Company Limited是一间于1905年在斯里兰卡注册的公司，分别在马六甲、雪兰莪和霹雳拥有橡胶园丘。1907年，该公司以“The London Asiatic Rubber & Produce Co. Ltd.”之名注册以转接“Asiatic Rubber and Produce Co. Ltd.”的业务。The London Asiatic Rubber & Produce Co. Ltd当前的地址位于士毛月。详情可参考：Archives in London and the M25 area (AIM), <http://goo.gl/2Fs1rx>。

参考文献

中文部分：

- 爱新村多媒体n.d.[a]。《锡米山新村简史：雨水冲出锡米来》。读取日期：2011年2月15日，取自<http://goo.gl/mbt2cZ>。

- ____ n.d.[b]。《武来岸新村简史：从天而降石拿督》。读取日期：2011年3月15日，取自<http://goo.gl/qAATAO>。
- ____ n.d.[c]。《呀吃十四英里新村简史：四师爷自选庙址》。读取日期：2011年3月15日，取自<http://goo.gl/edOf4Z>。
- ____ n.d.[d]。《呀吃十八英里新村简史：香骨削成一片天》。读取日期：2011年3月15日，取自<http://goo.gl/R09c1w>。
- ____ n.d.[e]。《仁嘉隆新村简史：佛光山法雨甘露》。读取日期：2011年3月15日，取自<http://goo.gl/IAzIzh>。
- ____ n.d.[f]。《蕉赖十一英里新村简史：打造吉隆坡米仓》。读取日期：2011年3月16日，取自<http://goo.gl/A9awvd>。
- 陈爱梅2006。〈经济大萧条时期霹雳的社会及矿场华工状况，1929-1933〉。《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9：19-33。
- 陈达生等1987。《普及词典（Kamus Am Terbaru Bahasa Malaysia）》。吉隆坡：普及出版社。
- 《东方日报》2003年11月28日。〈强拆民屋全国瞩目·锡米山新村回首来时路〉。
- 《光华日报》1949年2月10日。〈僻壤村民处置问题研究委会·报告书全文正式发表·现为各州及殖民地政府密切考虑中〉。
- 霍刚略1959。〈校史〉。载校刊编辑委员会，《雪兰莪加影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校刊1952-1958》。加影：雪兰莪加影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
- 加影商矿公会1985。《加影商矿公会庆祝75周年钻禧纪念特刊（1910-1985）》。雪兰莪：加影商矿公会。
- 净妙佛教协会n.d.。《佛山简介》。读取日期：2015年4月1日，取自<http://goo.gl/FI8kft>。
- 蓝子雄1988年8月7日。〈“不见锡米不见山系列”第4篇：获地建家园·每户缴85元〉。《中国报》。
- 李成金2006。〈乌鲁冷岳华人史——前言〉。转引刘崇汉2008。《加影华团影响力研究》，未出版。
- 刘崇汉1998。《吉隆坡甲必丹叶亚来》。吉隆坡：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
- ____ 2008。《加影华团影响力研究》。未出版。
- 林廷辉、方天养2005。《马来西亚新村——迈向新里程》。吉隆坡：策略分析与政策研究所。
- 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2003。《马来西亚华人锡矿工业的发展与没落》。怡保：马来亚华人矿务总会。
- 倪可健2005。〈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设教百周年史略〉。载丘炎蓓，《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设教百周年纪念特刊（1905-2005）》。加影锡米山：加影基督教卫理公会。
- 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校刊编辑委员会1959。《雪兰莪加影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校

- 刊(1952-1958)》。雪兰莪：锡米山标准型华文小学。
- 《星洲日报》1972年5月25日。〈大马印尼签署语言文化教育合作协定·组织版权问题常务委员会·促进官员教师学生交流〉。
- _____. n.d. 《新村浓情：从采矿割胶业转型·锡米山工商业蓬勃》。读取日期：2011年1月25日，取自<http://goo.gl/6Z4w6P>。
- 杨贵谊、陈妙华1972。《马来语大词典》。吉隆坡：世界书局有限公司。
- 《中国报》2009年7月22日。〈走入新村·锡米山新村曾是锡米源源·3万村民安居乐业〉。
- 朱东芹2002年6月。〈十九世纪的华人私会党与马来亚锡矿业〉。《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54-63。

英文、马来文部分：

- Andaya, B.W. & Andaya, L.Y. 2001. *A history of Malaysia*. 2nd edition.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 Comber, L. 2008. *Malaya's secret police 1946-1960: the role of the special branch in the Malayan Emergency*. Clayton: Monash Asia Institute,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Inch Kenneth Kajang Rubber Public Ltd. Company 2010. *100 years of establishment*. Kuala Lumpur: Inch Kenneth Kajang Rubber Public Ltd. Company.
- Iskandar, T., &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1970. *Kamus dewan*. Kuala Lumpur: Dewan Bahasa dan Pustaka.
- Jackson, J. C. 1968. *Planters and speculators: Chinese and European agricultural enterprise in Malaya, 1786-1921*.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Li, D. J. 1982. *British Malaya: an economic analysis*. 2nd revised edition. Kuala Lumpur: Institut for Social Analysis (INSAN).
- Majlis Perbandaran Kajang n.d. *Latar belakang*. Retrieved on 13 February 2011 from http://www.mpkj.gov.my/latar_belakang.